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论文选编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A755-42

目 录

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的杰出贡献	司兆勋 (1)
带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方法论及其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吴玉黎 (11)
一个伟大的理论与实践	卢培琪 (23)
试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道路	张 凡 (30)
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的理论及其新发展	刘金江 (36)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质量第一”的思想	李业斌 王传玉 (44)
坚持党性原则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江愚夫 (50)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轻重相互关系的经济思想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迟书功 (56)
毛泽东同志的人口思想及其在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发展	张秀娟 (64)
保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严整性和纯洁性	李光耀 (72)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建党理论与整党整风	张建国 (79)
学习和掌握在对立中把握统一, 在统一中把握对立的思想方法	衣 芳 (89)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	邢志第 (95)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伟大贡献	魏茂明 (103)
引进先进技术, 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魏继贵 (109)

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杰出贡献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司兆励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从事社会实际调查的开创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邓小平文选》第109页）他号召全党同志深刻认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保证我们的事业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向社会进行实际调查，不是毛泽东同志的首创，也不是始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法国的李柏烈，英国的布思、罗屈、鲍莱等，早就做过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调查积累的资料和他们的理论成果，素来是注意吸收利用，为自己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服务。但是，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思想，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对于社会实际的调查，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马克思花费四十年心血创作的《资本论》，实际上是一部调查研究成果的光辉巨著。

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农民领袖，注重调查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说明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既明了己方又深知彼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战行动，才能克敌制胜。唐代初期的政治家和历史家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不调查研究，只是偏听偏信不对。《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等等。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目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调查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他们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和实践，却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注重调查研究的传统，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调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事实根据，而且通过对于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认为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和把国际指示、外国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且指出，纠正教条主义，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只有向社会实际作调查”。（《农村调查文集》第4页）这不仅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阐明了调查研究在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是为无数事实一再证明的科学真理。但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由于发展的历史不同，国内的阶级关系不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不同，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因而，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早在一八八一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就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诚然，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各国共产党人之间，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互相援助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基本的方针应该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点上。就是说，要依靠各国的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正确而坚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和率领无产阶级及全体革命人民共同奋斗，才能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农村调查文集》第7页）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强调了了解中国国情，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结合呢？另一个是一定要明了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全然无知，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就根本无从谈起。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农村调查文集》第15页）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农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指导，进行周密的深入的调查，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最基础的知识。这种调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

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是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而且，我们共产党人是搞实际斗争的，更须要随时了解变化着的情况。才能做到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把革命不断地引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为了摸清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道路，制定正确的策略，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就注重对于中国社会情况的调查。北伐战争时期，他多次深入农村、城镇、矿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权和同盟军等重要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发展道路。他不仅在实践上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亲自开辟井冈山、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总结了党的领导人创建的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论证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和希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指明了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通过社会调查，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探索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发展正确道路，为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也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比如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决议之前，曾经召开了一系列有战士、各级领导同志参加的讨论会和调查会，还多次召开有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党代表等参加的联席会议，进行党内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因此，他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决议，符合实际情况，成为指导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再比如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富农在抽多补少时拿出去的只是坏田，不肯拿出好田的情况，因此，同年六月他主持召开的汀洲会议（也称南阳会议）通过的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分配土地时不仅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这样更有利于限制富农，支持贫农，从而把土地革命不断引向深入。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能够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探索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解决革命当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是同他长期坚持社会调查、深入研究实际分不开的。

（二）认为调查研究是获得正确认识，

形成正确思想路线的基础和前提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农村调查文集》第1、13页）这两个著名的口号，深刻地阐明了不仅要调查，而且还要做正确的调查，才能获得发言权，把调查研究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前提，就是承认客观的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对象和根源，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人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列宁指出，唯物主义“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列宁选集》第2卷第24页）做一个唯物主义者，讨论研究问题时，就要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或者书本上的定义出发；就要坚持反映论，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加以反映，是什么就说什么，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不能夸大，不能缩小，不能附加任何主观随意的成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起码要求。

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是极其复杂的。单就某一个事物来说，就有它的现象方面和本质方面，而且现象和本质往往是不一致的，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并且一个事物又总是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而存在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要认识复杂的客观世界，不是粗略的调查所能奏效，更不是那种走马看花、到处打听一下的所谓调查所能实现的，必须进行正确的调查，要努力做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获得真正的发言权。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正确调查，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指导，对客观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阶级社会里进行社会调查，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做到正确调查的有力武器，也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弄清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考察毛泽东同志社会调查的实践，阅读他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调查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调查了解我国各种社会阶级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的气力，花费了很大的功夫，阶级分析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每次调查的全过程。

做到正确的调查，必须坚持科学性，切忌主观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只能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如果在调查之前，就抱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者是带着某种预先确定的“框框”到调查中去为自己的主观结论找“证据”，那就根本称不上是什么调查，而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坏作风。这种所谓调查，不仅不能反映客观实际，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革命事业肯定是有损无益的。毛泽东同志进行社会调查，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因此能够

得出科学的结论。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写到农民卖儿子的悲惨情景时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因此，毛泽东同志更加坚信这样的结论：“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农村调查文集》第150—153页）

正确的调查，还必须是周密的、深入的。所谓周密的调查，就是要全面的系统的历史的调查，要了解事物的全貌和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不能满足于对于事物的片面的或片断的观察。所谓深入的调查，就是要下马观花，深入实际，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弄清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性，不能仅仅根据看到的一点表面现象就下断语，作结论。那种单凭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们从毛泽东同志写的大量农村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他既调查农村的现状，也调查农村的历史；既调查农村中土地革命斗争的情况，也调查革命战争条件下农村经济、文化、政权等方面建设的情况；既有数量方面的各种数字的统计，也有揭示事物本质方面的分析论述。他的调查结论，不是个人断定，而是同到会人进行讨论，共同作出的。这种调查所获得的结果，足以成为制定斗争策略的可靠依据。

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指出，调查研究要经常不断地进行，不能一劳永逸。他说：“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这就告诉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坚持不懈的进行，不能满足于一时的调查，也不能满足对于客观事物已有的认识。我们的历史使命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永远没有止境，对于客观世界的调查也就永远不能停止。

（三）认为调查研究就是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寻求真理

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经验最实际，知识最丰富，智慧最深广，创造能力最伟大。我们向社会实际做调查，就是向人民群众做调查，就是向群众学习。

到人民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从认识论上来说，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一致的。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种过程循环往复，实际

上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形成认识，又通过调查研究来检验认识之是否正确的认识运动过程，也就是向群众寻求真理又通过群众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寻求真理，必须确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必须具有甘拜群众为师，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以小学生的姿态向老师求教的态度。这是做好调查的根本条件。只有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把群众的实践看作是知识的源泉，才能够自觉地到群众中间去，虚心求教，通过调查获得真正的知识。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毛泽东同志每当谈到调查中向他提供材料的群众时，总是表露出学生对先生的深深感激之情。比如，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向他提供城市问题材料的两位老先生时说：“多谢两位老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当回忆到调查中邀请过的那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时，称这些人是“可敬爱的先生”，“都给了我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在《兴国调查》中对于应邀到会的八个人表示“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农村调查文集》第183页）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具有诚恳向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有着强烈的向群众学习的迫切感，把向群众学习引为快事，所以能够随时注意向群众学习，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社会调查，不断地从群众中获得新的知识。

向群众学习，向群众寻求真理，还必须做到以平等态度待人，和群众做知心朋友。毛泽东同志说，要使被调查的人讲真话，“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他在兴国调查时的情景。他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意，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这就告诉我们，到群众中做调查，给群众当学生，必须是毕恭毕敬，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这样，群众才会推心置腹，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使我们获得真实的情况，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四）认为调查研究是端正党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注重研究历史和现状，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本本出发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极坏的作风”。并且强调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

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九六四年版第800、797、802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调查研究提到了党风、党性的高度，把开展调查研究同加强党的建设直接地联系起来。

调查研究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党的作风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领导，都不做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客观实际。他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他们既是实行了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也败坏了党的作风。这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错误，给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只有克服这种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重视教育全党注重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端正党风，加强党的建设的。早在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就指明了主观主义的危害，规定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之一，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九六四年版第94页）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进一步阐明了加强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特别指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党中央还把加强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当时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各解放区相继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具体组织和指导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不仅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当时整风运动的发展，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干部。一九四二年一月，张闻天同志率领调查团到延安附近县、市进行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返回延安后，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出发归来记》，生动地记录了他通过社会调查实践以后的思想变化，科学地总结了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的基本态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张闻天同志的心得体会，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反映了广大干部通过社会调查思想上的进步和提高。

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和带动下，对于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逐步深入，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范围兴起。广大干部通过社会调查，不仅大大丰富了感性知识，而且提高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五）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不仅深刻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正确态度，而且通过总结调查实践的经验，大大丰富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第一，注重典型调查，解剖麻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

事物都一件件的调查研究清楚，只能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出有代表性的典型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说：“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

毛泽东同志进行社会调查，总是注重典型调查的。从农村调查来说，有调查一个县的，如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有调查一个区的，如兴国县永丰区调查；有调查一个乡的，如兴国县上社区长冈乡调查和上杭县才溪区才溪乡调查；有调查一个村的，如吉水县的木口村调查和东塘等处的调查；也有调查一家一户的，如兴国县十区八个家庭的观察。这些调查对象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典型性。比如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便可知道大概。兴国县的永丰区介在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之交，明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而且可以大体了解到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兴地县的长冈乡和上杭县的才溪乡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更具有典型性。毛泽东同志正是通过这许多典型调查，由个别概括出一般的结论，既了解到农村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也弄清了农村的基础概念。

当然，强调注重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并不是说从某一类事物的典型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完全概括同一类事物的一切特性，因而可以用这个结论硬套在一切同类其他事物的头上，只是说从典型调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研究同类其他事物的指导，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同类其他事物的具体解决，仍然需要对该事物做具体的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开调查会。邀集三、五个人一起开调查会，不仅可以有问有答，而且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补充和订正，通过讨论对所调查问题作出结论，更容易符合客观实际。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

对于如何开调查会，毛泽东同志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应当邀集真正有经验的、深切明了情况的、有代表性的人到会；到会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而定，一般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要事先准备调查纲目，按纲目逐一发问；要采取同志式态度，作讨论式调查，互相补充，彼此争辩；要亲自口问手记，既当主席，又作记录，不能假手别人；调查问题所得结论应与到会人员讨论商定，等等。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同志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他的几个著名的调查报告，就是依靠开调查会收集材料写成的。

开调查会是一种基本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除了开调查会之外，还有个别谈心、实地调查等等方式均可使用。毛泽东同志也是注意利用其他方式进行调查的，如记录会议上汇报的典型材料，个别走访，通信以及派出调查组等等。

第三，要详细占有材料，抓住重点。具体的事实材料，是分析研究问题的根本依据和基础。只有首先详细的占有材料，然后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但是，收集材料也不能不分主次、有关无关，什么都要，而是要选择那些于所调查的问题有关的，选择那些能够说明问题，反映事物本质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

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农村调查文集》第25页)

我们从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他通过调查所收集整理的材料,确实是大量的、极为详细的,这些材料又都同当时民主革命和农村根据地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有关,有着重要的价值,能够成为分析研究问题的事实依据。



毛泽东同志从事社会实际调查的活动,在实践上为全党作出了榜样。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贡献,是他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具有独创性的并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观点。这个科学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离开了它的指导,在工作指导上就要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所以犯了严重错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61、262页)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严重失误,给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损失。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任何人,包括创立科学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内,都必须严格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否则,就必然要犯错误。

现在,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十二大指引的正确道路,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我们面临的情况,不仅跟过去战争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是比之建国初期,也有得大的差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调查的某些方法和手段,可能会有些不同,对于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言论和实践活动,不能搞“两个凡是”,不能照搬硬套,简单模仿。但是,毛泽东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同志创立的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的实践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紫阳同志等领导同志,为了摸清中国的国情,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描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总是极端重视调查研究。他们不辞辛劳,亲自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城市、农村、矿区、工地,直到工人、农民家庭,调查访问,了解情况,还通过各种会议、派出调查组等方式,广泛地进行社会实际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尽管这些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规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就要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要克服主观主义,认真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 8 •

只要全党同志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发扬光大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

带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 科学方法论及其在新时期的运 用和发展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吴玉黎

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方法论，即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科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这种科学理论进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概括新经验，从而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的过程中，首先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切实做到正确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增强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找出新办法、打开新局面的能力，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拥有大批这样的干部，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领导群众胜利前进的重要条件。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内容非常丰富的完整而深刻的科学体系，它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正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及其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学说“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而严整的科学世界观，

所以转过来它又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历来都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意义，反复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谓行动指南，可以说就是指导行动的根本方法。恩格斯很明确、很精辟地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时也着重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国革命带有独创性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运用来观察事物，分析情况，指导行动，处理问题，世界观就转化为方法论，即成为我们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换句话说，方法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规则、工具和武器，就是在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过程中实际上起着总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的世界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为形成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理论活动，包括哲学活动，是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服务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因此，在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历来就十分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它的每一个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这方面，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哲学著作，包括具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在内，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的特点。从形式上看，他更多地使用了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采用了为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的论述方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内容上看，它对每一个哲学问题的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说明和发挥，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独创性经验的哲学概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不仅最早认识和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全面而透彻地阐明了实现这种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他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理论勇气，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反对把苏联经验神圣化。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却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和哲学论证，是带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在理论工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最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变成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哲学真正从哲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是提出了一整套带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关于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科学理论，这在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中是一件带有根本意义的大事。他提出的许多方法论原则，诸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主观指导要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研究问题要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善于捉住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学会“弹钢琴”，分清主流和支流，抓两头带中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和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学用结合、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一般和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已经广为流传，从而使我们党的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运用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科学方法论中，其核心部分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它们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分别作了精辟的阐述，着重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方面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的贡献。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且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中国革命经验在哲学上的总概括。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坚持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这样的概括：“‘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

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同党性、党风紧密地结合起来，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明确地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共产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因而是党风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党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关系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和生动体现。要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相信和依靠群众。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依靠群众的实践来认识世界，又从来就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54页）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观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杰出的贡献。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共同奋斗；但要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认为中国问题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自己作出决策，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和指挥。正象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特别是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加需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国际援助的因素是重要的，我们要争取，但不能依赖它。我们党就是这样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同样是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当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社会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不仅国内交换在扩大，国际交换也在扩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也不可能掌握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技术，就是象我们这样的大国也不例外。我们一定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家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学习外国一切先

进的东西，扬长避短，洋为中用，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因此，正确处理本国与外国、本党与外国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既反对盲目排外、闭关自守以及任何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思想行为，也反对在别的大国、强国、富国面前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任何的奴颜婢膝、卑躬曲节的表现。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密不可分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的运用，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方法和途径这个根本问题的。实事求是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和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群众路线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智慧、力量的源泉和工作路线方面的问题，独立自主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和基本方针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卓有成效地改造世界的问题。

(二)

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都比较重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广大的干部，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结合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在实际斗争中，革命任务的提出固然重要，但它离不开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任务确定之后，又必须通过采用正确的工作方法去实现。思想方法是否正确，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关系到能不能正确地提出任务和实现任务，甚至关系到整个工作的成败。在全国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重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好传统仍然得到保持和发扬。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左”的偏差，滋长了教条主义习气和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是把这些错误倾向推向极端，使党的长期行之有效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遭受歪曲、践踏和破坏，结果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极不正常的局面。党的思想建设面临着空想的危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起，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大力倡导的科学方法论，进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科学的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下面，仅就我们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上谈谈我的体会。

第一、重新确立了 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动乱。但是，我们党仍然面临在徘徊中前进的艰难局势。这不仅是因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遭受